

## 第一章 走向科学

芳子问我：“爷爷您常说，小时候您读书不好，老师称您为‘造粪机’，那您怎么会成为科学家的呢？难道是机遇？”我回答她，这是肯定的。我怎么不是造粪机，哪里谈得上是什么“家”。造物主给我机遇，使我在人生道路上认识自己和鞭策自己。

1937年8月13日，日寇在上海登陆，侵略我国，这在我国历史上称为“八·一三事变”。在我家门前的那条河流是这个小镇通往都市的主要水上干道，我每天站在家门口看那驶来载满难民的船只。两岸居民向他们打听：“上海情况怎样？我们能抗战到几时？”大敌当前，人民同仇敌忾，到处可见。那年我获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录取通知。金陵大学以办农科而著名，但我投考的不是本科，而是专修科。因为专修科学费低廉，而且两年即可毕业，我家尚能勉强支付我两年的学费，这是我投考农学院专修科的原因。在那国难深重的日子里，我留在家乡，还

是去南京报到入学？祖母是极力要我留在她身边，但我几经考虑，决定去南京入学。父亲在我临行前，对我说：

“千万要注意敌机的轰炸，要避免无谓的牺牲，必要时可以从军抗日。”这句话在我以后的流亡生涯中一直铭记在心。10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终于离家。母亲将东拼西凑的九十多圆钱放在我的内衣里，给我做好两床被套，要我到学校时买棉絮装上。因此我只带了一个手提的藤箱就上路了。祖母、父母及我的两个妹妹都到家门前的那座小桥边为我送行。我含着眼泪和他们握别，这一别就是八年。

南京连日遭日机轰炸，金陵大学已迁往武汉，但农业专修科则迁到安徽和县的乌江镇。我从小镇搭火轮到苏州，当时阊门一带的街头都是从上海撤回的前线伤兵，从苏州去南京的火车因怕遭敌机的轰炸，已经无法搭乘，所以我一到苏州就改乘长途汽车至无锡。在无锡的一家小客栈中住宿一宵后，继续乘车抵达南京。此时南京刚遭敌机轰炸，我就匆匆赶往下关，再搭轮渡至北岸浦镇，找到一家小客店住宿。翌日晨在大雨中我折回下关，然后搭轮至安徽和县。一上岸就是和县的乌江镇，这样我就找到了迁在一家祠堂内的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注册上学了。在乌江镇上外界消息全无，但心中一直担心在战火中家人的安全。我想家，特别想念我的祖母。我几次走到乌江镇边的霸王庙前，凭高远眺，俯瞰长江，默默地祝愿故乡无恙、我家无恙。

11月末忽然学校通知，农业专修科要西迁至武昌，要大家整理行李离开乌江。于是同学们登上了两艘雇来的

大帆船，直驶安庆。到了安庆后我们在轮船码头排队等候那还停在江中的一艘客轮“大上海号”。到上船时已是深夜。我们排在许多旅客的后面，而我又是排在同学们的最后。所以等我上船时，甲板上所有的空位已经客满，但我总算找到了一个放在甲板旁的救生艇，我一个劲就钻到里头睡觉了。抵达汉口，我们被安置在一个教堂里。那时我们才知道，大场失守，淞沪沦陷，南京已岌岌可危了。金陵大学原先迁到武汉华中大学的部分已准备西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大学，而我们去向未定。我因为记得同乡钱其相在武汉大学法律系念书，就写信给他告诉他我在武昌的地址。不久其相就赶来武昌看我了，他告诉我武大在准备西迁，他要我搬到他在武大的宿舍去住，不要等金大内迁的消息了。在这个时候遇见幼年时的同学，我是多么的高兴啊！我也管不了什么了，立刻把我想去武大居住的意见告诉老师，老师表示同意，于是我当时就随同钱其相渡江去武昌珞珈山，到武大和他同住在列字斋 75 号宿舍。

在武汉大学我一住就是两个多月。我曾听过武大学生会组织的关于抗战的报告。陈立夫、周恩来都向同学们做过报告。陈立夫善于辞令，将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干预上。周恩来是由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的几位同学陪同来的，他强调持久抗战，坚信抗战必胜。他的报告使同学们对国家前途增加了信心。武昌和汉口到处贴着大幅标语“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抗日气氛的高

涨使我忘却了离家之苦。

12月12日南京沦陷，武汉受敌机的空袭增多了，武汉大学决定迁往四川乐山。我正在彷徨，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忽然一天在汉口街头看见了我的同乡马应朋，他知道我流落在武汉，告诉我他去广西的工作地址，要我必要时去找他。有了一个去处，我当时心中踏实多了。后来不知怎的，我又在汉口街头看见了一张贴在墙上的报纸，登载教育部对战区学生登记去后方学校借读的通告。于是我就找到那个登记处，鉴于马应朋在广西，我就登记去广西大学农学院借读。当时我对此不抱什么希望，哪里知道正是这个机遇使我在流亡生涯中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去处，这个去处对我今后的科学生涯多么的关键啊！

## 一、广西大学借读

1938年3月初的一个早晨，钱其相送我至武昌，乘开往衡阳的火车。我预备到衡阳后再去广西投奔马应朋。在衡阳我住宿一宵，然后改乘汽车去黄沙河镇，那是广西和湖南交界处，从这里隔河我就看到广西境内竖起的一块令人醒目的横牌，写着：“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在流亡途中，我看到它，精神为之一振。我在黄

沙河旁的一家伙铺住宿一晚。翌日晨继续搭车，渡河时汽车开上水上的木排，由木排顺水漂流撑到对岸广西，然后直驶桂林。到达桂林站，所有旅客都要登记在桂林的住处。我因不知住何处是好，向站上的执勤警察打听，他告诉我桂林只有一条大街，有不少旅馆，建议我可以填桂林旅社。因为他知道我是流亡学生，诚恳地告诫我在旅馆里不要住过一个星期，否则就有被抽壮丁的危险。我就按他的忠告，在登记单上填了桂林旅社，随着也就住进这家旅馆。马应朋在汉口时告诉我到桂林后可去找他江苏教育学院的同学、现在广西省教育厅工作的孙某。所以到桂林的第二天我就去教育厅找他，一见面他就热忱地陪我去车站，买了去贺县的汽车票。贺县地处广西梧州境内靠近广东。我乘车经平乐至八步镇。八步镇是广西产钨矿的重镇，我住宿一宵后，翌晨再搭车至贺县。记得到贺县在上午 10 时左右。我急着走到贺县初中，问门房要见马应朋，哪知门房回答我，学校没有此人。这时我真慌了，我身边只剩两圆桂币，合国币一圆，如何是好？我赖着向门房求救，我说：“我家在战区，千里迢迢来找我的一个同乡马应朋，缘何他不在此地！”说时迟那时快，忽然一个教员模样的人擦面而过，听到我的话后回头对我说：“有，马应朋是在这里，我去通知他。”不久马应朋出来了，我多么高兴，似绝处逢生。在贺县中学，我和马应朋住在一个小楼上的宿舍里，平时帮助学校做些缮写工作，大多时候为老师们的讲义刻钢版。每天吃饭时，校工将伙食送到宿舍里，应朋总是将碗里仅有的一个荷包蛋用筷子

夹成两半，将一半给我。每隔两周他带我去贺江边的一爿茶店吃“甜包”。患难中的友谊真是无价的。在贺县中学我呆了约三个月，正处在前途茫茫中。一天我独自走向街头，看到一张报纸登载教育部分配战区学生入后方大学借读的名单。我急着找分配在广西大学的名单，一看就发现我的名字，我被分配在柳州广西大学农学院借读。我多么高兴，立即奔回学校告诉马应朋。应朋听到这个好消息如同亲受，为我祝贺。7月底应朋也决定离开贺县中学去他的母校，在桂林七星岩的江苏教育学院工作，我随他同行，到桂林后两人分手，临别依依。他嘱咐我如果在经济上有什么困难要告诉他，他会接济我。抗战胜利后才知应朋病逝广西 恩情未报 一生遗憾。

广西大学农学院在柳州沙塘。我从柳州乘车抵达沙塘，停车站靠近广西省农事试验场的办公大楼。我拿了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学生证到办公室去询问关于广西大学农学院借读的事情。哪知见我的却是场长马保之先生，他是马君武先生之子，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他非常热忱地为我打电话给农学院院长王益涛，告诉他我是战区学生，由教育部分配来借读的，希望能到学生宿舍去住。哪知王益涛一口拒绝，说暑假期间不能分配宿舍，要等到9月开学时才能住人。马保之二话没说，再打电话给农业试验场的苗圃，介绍我去苗圃住宿。于是我就去找苗圃的负责人顾文裴，很巧，顾文裴也是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毕业的，他要我和他同住在一间宿舍里。在苗圃，我早晨起来和工人们一起干农活，后来跟一位浙

江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叫李维庆的技佐，做水稻杂交试验。根据水稻雄蕊对温度的敏感性，将花蕊先置于有约 50℃ 的热水瓶内处理约半个小时后，使雄蕊失活，然后将计划中进行杂交用的植枝的花粉喷上，再用黑纸包好。我最感兴趣的是试验栽培的陆稻，好大的枝叶，生长旺盛，长出深紫色的稻谷，但据说稻谷产量不高。为了温习英文，我借到一本开明书店出版的杜肯涅夫著的《初恋》英译本，每天早晨在出工前，我总是捧着它在田埂上高声朗读，背诵其中我觉得有用的词句。在苗圃一个月我得识了好友郭銚，浙江孝丰人，浙江治虫人员养成班毕业，他一直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业。可是后来我离开沙塘后就中断联系。至今我时常想念他，几次打听他的消息都没有结果，但愿他健康尚在。

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广西人，原北平大学校长，而农学院院长王益涛，原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王益涛曾留学日本，在前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广西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大部分来自北平大学农学院留学日本的，如著名的生物统计学教授汪厥明，昆虫学教授易希陶，作物栽培学教授程侃声等。细胞遗传学教授于景让是抗战开始刚从日本回国的，只有植物学教授兼广西植物研究所所长张肇騫是留学英国的。张肇騫是浙江温州人，与王益涛是老乡。可知那时“派别关系”的泛滥。我初到时王益涛之所以拒绝我迁入校内住宿，主要因为介绍人马保之是“留美派”的缘故。广西大学农学院设有农艺系、病虫害系、畜牧系和森林系。在沙塘这个偏僻的小镇上，一边上课一边

还在建筑校舍，在我的回忆中倒是一个宁静而朴实的求学之地。在那里我有幸得识我的恩师张肇骞教授，因为我上他的普通植物学课而对植物学发生兴趣。在课余我常常到植物研究所去找他向他求教一些植物学方面的知识。老师知道我流亡在外，生活困苦，有时叫到我家中作客。师母桂秉镛，江西人，常常告诉我一些中国生物学界前辈如秉志，胡先骕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也是从师母那里知道我师张肇骞是浙江永嘉县永强镇出名的孝子。我一直崇敬我的老师，听从他的教诲。第二位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于景让教授。于先生的文学底子很好，那时柳州也受到日机的轰炸，在逃警报时他常和他的助教张培英（后来成为他的夫人）将一些外文短篇科学论著翻译成中文。他翻译得很快而且译文流畅。于景让先生为人正直。他对农学院院长王益涛在周末用车去桂林看京戏表示不满，因而成为当时留日派教授中不受欢迎的人。于景让一直关心我的学业，1947年我将赴美国留学，在上海遇到他，那时他任台湾大学教授，他将出售一套关于农学研究的外文杂志所得的70多圆美金送给我。自从这一年见到后，就没有再见。

在广西大学农学院我正过着满意的学校生活时，一天张肇骞师忽然告诉我，广西大学将改为国立，由马君武任校长，农学院院长亦将由马保之担任。因此农学院的大部分教授都将撤换，由农事试验场的高级技术人员如陆大京、柳支英等任教。张肇骞师虽然马保之一再挽留他，但他决定去贵州湄潭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鉴于

我对植物学有兴趣，肇骞师介绍我去昆明西南联大上学，希望我能赶上联大这一年度的转学考试。他为我写信给西南联大生物系教授张景钺，同时也写信给云南大学生物系主任严楚江。肇骞师告诉我张景钺是他在东南大学求学时代的老师，严楚江是他的同学。他说西南联大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如能考上对我的前途将有很大影响。但如没有考上，可去云大上学。老师对我的苦心可见一斑。

我在 1938 年 7 月中旬离开沙塘，到柳州后翌日的一个清晨，我就去找在柳州候车去贵州的肇骞师。当时肇骞师住在一个旅馆里，他还没有起床，从蚊帐中伸出手来给我早已预备好的 200 圆国币，叮嘱我到昆明后就给他回信。我从柳州到昆明须经贵阳，于景让先生与我同行，因为他去成都四川农业试验场工作，也须经贵阳后转车。我们坐的车，座位都是木板做成的，我坐在车子的后座，汽车一路上颠簸，我的屁股都破了。血液渗到我的裤子外面，痛苦不堪，但我忍着，到了贵阳才告诉于先生。在贵阳约三天，于先生邀我吃了几顿美餐，他要我考好西南联大的转学考试，说这对我将来太重要了。他为我买了由贵阳经云南曲靖去昆明的汽车票。记得在我去昆明的前一天，他先乘车去四川成都。

广西是收养我这流亡学生的地方，也是我进入大学之门走向科学的起点。当我离开广西去云南途中，我思念不止，犹似我第二次离开故乡。

## 二、西南联合大学

我到昆明后，去找我在小学时的同学钱任，那时钱任在云南大学化学系念书，也在准备转学西南联大。从他那里知道转学西南联大并不容易，于是我就改变主张，先去云南大学找生物系主任严楚江。生物系在云南大学的一座高楼叫会泽楼的底层。我见到严楚江先生，交给他肇骞师给他的信。严先生对我表示欢迎，还向我介绍云大生物系的教授，如崔芝兰、徐仁还有同济大学生物系在此兼职的石声汉等。他要我在这里安心上学。严先生将我托付给他的助手潘清华。当天我住在潘家，翌日潘先生为我办好住宿手续，住在云大的学生宿舍里。但此时我的心思不在云大而在西南联大。我知道转学考试的日期已近，我必须去联大找张景钺教授。

一天上午，我摸到西门外西南联大“新校舍南区”，在一排简陋的平房里找到张景钺教授。我向他自我介绍，并给他肇骞师的介绍信。初次见面我觉得他平易近人，语言不多，但又感到他很严肃。他看到介绍信后，写上几行英文批示，要我拿介绍信和广西大学农学院一年级的学业成绩单去找系主任李继侗。我记得张景钺师在介绍信上写着“*He is earnest. . . . .*”，我偷看后暗暗自喜，猜想老

师第一次见面就对我有了好感。我找到李继侗先生后，李先生要我留下在广西大学借读的成绩单，并告诉我转学考试的日期和地点。这次参加转学考试的有 10 多人，我总算被录取了。按学校的规定，第一学年为试读生。一年后成绩及格才可成为正式生。我考取联大以后却不敢告诉严楚江先生，怕他不高兴，但最后我还是去找他了。哪知严先生热忱地祝贺我能去西南联大上学，随张景钺教授学习。一个科学家的风范深刻地教育了我。我感到惭愧，因为我做了一件极不诚实的事。我投考联大，事前没有告诉严先生，而且这样做也违反了肇蹇师的原意，虽然事后肇蹇师还是原谅了我，但我怎能原谅自己。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我国北方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和南开在云南昆明联合而成的。西南联大的校歌是：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兴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返燕碣。

这个至今流传的联大校歌，指出了联大精神。联大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学生有扎实的根基、渊博的知识。读人文科学

的学生要多知道一些自然科学，而理工科的学生也必须知道人文科学。理学院的学生在一年级时必须上数理化共同的必修课。而且这些所谓普通课都是由著名教授，一般由系主任上的。我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学过的一些功课都不承认学分，如高等数学、普通化学，甚至国文和英语都要重修。因此我转学联大的第一年，也就是第二学年，我功课繁重，感到吃力。这一年我成绩平平。记得我补修的普通化学是由化学系主任杨石先教的，第一学期我只得 60 多分。最使我感到突然的是我的作文成绩只得 66 分。朱自清先生找我，他说，他知道我有些不服气，所以向我解释，大意是“作文是语言的艺术加工，不是辞藻的堆砌。而辞藻也决不能杜撰的。作文要有内容，有文法”。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从此我作文时注意到用词与文法。体育课是必修课，而且从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必须上体育课。体育的总负责人是马约翰教授，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依然神采奕奕，穿了一件皮夹克往来于同学们中间。男同学的体育课由黄中妥和侯洛询负责。上课都讲英语。我选过黄和侯两位老师的课，上课时先跑两圈，老师在旁边喊着“left, Right! Left, Right!”。有时插几句逗人的玩笑话，使大家感到轻松愉快。我记得我在三四年级时都选侯老师的课。每学年开始大家都排队报名。有一次当各自报姓名时，排在最后的一位是个矮个子，化学系的王宝贵，当轮到他报名时，他忽然高声叫出：“王——宝——贵”，顿时大家哈哈大笑，好像是“王八龟”。每学期都有体育考试，但如在一学期中没有缺过课，即使不考

试也给 60 分及格。同学很少有不及格的，主要因为大家需要它。

在铁皮做的屋顶和满是泥坑地皮的教室里，窗户没有玻璃，老师谆谆教导学生，学生则孜孜聆听老师的教诲，在那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联大为战时我国培养几多杰出的人才！记得我们所修的功课，老师都指定一本必读的参考书。在每堂课将上完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上“assignment”，要同学参考那些资料和完成课外作业。除上外文课老师讲外语外，有些必修课如数学课老师也都讲英语。还有些老师生在南方，如教我们植物学的吴蕴珍老师是江苏青浦人，上课时就以英语代替他的江南口音。生物系主任李继侗先生平时很少笑容，大家开始都有些怕他。他要求学生很严，每学期注册时，他逐个注意选修的课程，甚至选修课的老师。有时同学选修的是那些容易得学分的课程，或者是容易给学生及格的老师所主持的课，李先生总是讽刺地说：“不能选这种‘豆腐’课！”现在回忆，李先生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是正确的，因而我们常常纪念他。我的恩师张景钺先生教我们植物形态学。照例这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不容易引起大家的兴趣，但在先生的讲授下则不然。他以其渊博的知识从细胞分裂的动力学来解释生长点中叶原基（leaf primodium）和花原基（floral primodium）的形成。讲到植物演化与系统学时，他从古生物，植物性世代的演化，来教导学生。他的课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那时我对植物发育和世代交替发生兴趣，如苔藓类植物和蕨类植物的配子代（gametophyte）与孢子代

(sporophyte)，在基因组上前者为单倍体，后者为双倍体，但形态完全不同，我就想到遗传学的问题。还有，老师讲到一些苔藓类植物的个体是分枝状的 (diachotomous)，当生长到一定时间时在分叉处会形成一个死亡带，这样将个体分成两个。对这个繁殖现象我一直感到兴趣。这就是现在所谓程序性死亡 (programmed death)。老师就是鼓励我们去想象，去找兴趣。其实这是联大的学风，既严谨又鼓励每个人去表达自己，发现真实的自我。

那时昆明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一般都在早晨 9 时左右，刚好上第一节课，警报就响了。同学们习以为常，从容地从新校舍后门走向北面的山陵地区。记得有一天我看到离新校舍不远的山路上，有人用粉笔写上：“教授的图书馆从此向前走！”的字样。后来才知道这是同学告诉大家陈寅恪先生在那里，可以去听在课堂上没有听到的讲课。陈寅恪先生人称“教授的图书馆”，在那时我已经知道了。在躲警报期间同学们也常常假此温习功课或讨论问题。当敌机飞走后，警报解除，我们又从容地返回学校，如果时间尚早大家又都回到教室继续上课。

晚上自修的时间是学习紧张的时候。由于老师指定的参考书在图书馆里所存有限而且不能借出，所以晚饭后大家都在图书馆门前排队，希望能借到一本参考书，找个好位置坐下来阅读，但从不争先恐后去挤去抢。我有几次看到心理系的沈有鼎教授和大家一样也在排队。当图书馆的门一开，大家鱼贯而入，决不一哄而上。因为图书馆的座

位有限，我们常常到学校附近的凤翥街的小茶馆去看书。那里茶馆林立，后来成为联大同学念书、讨论功课或议论时局的场所。凤翥街靠近昆明城的西门，街上来来往往赶着小毛驴的小商贩，穿着一件皮制的背心，嘴里吸着一支竹制的水烟筒，当毛驴走得慢时，他们用一根皮鞭轻轻地打在毛驴的屁股上，嚷着：“你家嘛，咋个整！不听话啦！”随着毛驴不断拉屎，在石子铺成的街上响起噗、噗的声音。好一个诱人回味的景色！茶馆老板都很客气地接待我们这些穷学生。初时他们发现我们在茶馆里泡一壶茶一呆就是一个晚上，便悄悄地将屋子里的电灯换成了一个小号的，这样我们便无法在微弱的灯光下长期看书了。还有，他们将我们喝过的茶叶取出后反复使用，这样可以废物利用，省钱嘛！但同学们不计较这些，而且久而久之与茶馆老板熟悉了，结成友谊，于是小号灯泡又换成了大号，茶叶也不废物利用而给好茶了。茶馆成了联大同学的读书之家。联大人至今没有忘记凤翥街上的小茶馆。

### 三、西南联大——民主堡垒

春节期间，新校舍 32 号宿舍门上贴上一张红纸。横幅写上五个大字：“万般皆下品”。但这不是在宣扬“惟有读书高”，却是讽刺和警惕之意，要同学不要忘记教

国。有个进步组织叫群社，由群社出的一张墙报，定期贴在新校舍大门内的墙上，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鼓励同学为抗战胜利和建设明天的中国而奋斗。墙报的写作和漫画，引起同学们的兴趣。据说《云南日报》有时派人来摘录一些内容而转载。与群社墙报对立的是国民党三青团贴出的墙报，同样文采飞扬，为国民党辩护。记得为了一个天主教神父叫雷鸣远的问题两个墙报曾进行剧烈的“舌战”。我有幸得识我的同乡，联大历史系的任孝揆（又名任以沛），他是群社的创始人之一，他介绍我阅读罗曼·罗兰等的文学著作，要我知道爱憎分明。孝揆曾任驻印度使馆参赞，已故世多年，我常常怀念他。

那时教育部规定各级学校每周一都要举行纪念周。所谓纪念周，其实是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名义下，宣扬政府的政治主张。联大就不管这一套了，自行制定每月一次的学生集会，叫国民月会，在图书馆前的场地上举行，同学可自由参加。在国民月会上同学们曾邀请一些名人像陈立夫、杜聿明、宋希廉、林语堂等来作报告和回答一些问题。记忆犹新的是 1942 年的“倒孔运动”。鉴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联大同学发起“打倒孔祥熙”的运动。举行国民月会后，同学们列队进城游行。这个运动引起昆明各界的响应，不少学校的学生中途参加游行。梅贻琦校长得悉后，匆匆赶来用幽默但又严肃的口气向回到学校的同学们说：“我看到你们个个平安回来，松了一口气。你们以后写标语千万不要忘记标点，不然要惹大祸的啊！”校长这话是指同学们在游行时贴的标语：“拥护龙主席打倒

祥熙”中间没有标点，便成了拥护龙主席去打倒孔祥熙了。其实这是同学们的策略，并非偶然。梅校长的出现使返校的同学们感到温暖。3000 学生都怀有一颗心，联大是我们的家，校长是我们的家长。我们生活在自由、民主、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中。

西南联大设有三个校长：北大的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和南开的张伯苓，但具体负责的是梅贻琦校长。梅贻琦校长主持联大校务，公平民主从无任何偏袒之心。教师之间、同学之间从来没有因为来自不同的学校而有隔阂。据说有一次教授们在西仓坡梅校长家开会，有一位教授忽然提起学校在分配担任系主任的职位上三个学校不够公平，就遭到大家的冷淡。因此任何不利于三个学校的团结互助的言论在那时是不存在的。西南联大集北大的兼容并蓄、清华的严谨、南开的豪迈之风于一炉。联大校歌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说出三校之所以成为联大者旨在洗雪国耻、振兴中华，因此壮怀不折。联大同学受到优良风气的熏陶，均自觉地勤奋学习，讲秩序、讲礼貌，培养远大理想以天下为己任。

总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联合是应时代的需要，自发地自下而上、精神实质的整合，不同于自上而下的命令、组织形式的整合。

我的毕业论文是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戴芳澜教授指导下完成的，主要研究昆明地区的水生真菌。1942 年夏我在联大毕业，李继侗先生告诉我，我已分配到清华大学